

第四卷

Vol.4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清华大学出版社



公共管理评论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第四卷

Vol. 4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公共管理评论》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学术出版物,每年出版两卷。第四卷共收录7篇论文、1篇评论以及7篇书评。所收录的论文反映了国内外公共管理最前沿的一些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包括寻租理论、欧洲一体化与公共健康、城市危机管理、两岸认同、教育政策话语分析、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此外,本卷还收录了有关法国癌症治疗学重组的研究论文。评论收录的是一篇关于政策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的文章。书评是对六本译著、一本国内著作的介绍和评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本书防伪标签采用特殊防伪技术,用户可通过在图案表面涂抹清水,图案消失,水干后图案复现;或将表面膜揭下,放在白纸上用彩笔涂抹,图案在白纸上再现的方法识别真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管理评论. 第四卷/《公共管理评论》编辑部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4
ISBN 7-302-12820-0

I. 公… II. 公… III. 公共管理—文集 IV. D0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956 号

出 版 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组稿编辑: 周 菁

文稿编辑: 陆滢晨

封面设计: 李 莹

印 装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80×255 印张: 11.25 字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12820-0/G·711

印 数: 1~3500

定 价: 25.00 元

学术委员会

主 编: 巫永平

副主编: 彭宗超

English Editor: Nancy Hearst

学术委员会主席: 薛 澜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汉语拼音为序):

曹俊汉 台湾大学

陈振明 厦门大学

楚树龙 清华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邓特抗 香港大学

丁宁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胡鞍钢 清华大学

胡 伟 上海交通大学

景 军 清华大学

李 强 清华大学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林尚立 复旦大学

卢 锋 北京大学

路 风 北京大学

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

史天健 杜克大学

王乐夫 中山大学

王 名 清华大学

王浦劬 北京大学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

王有强 清华大学

魏尚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萧全政 台湾大学

许成钢 伦敦经济学院

杨大利 芝加哥大学

杨燕绥 清华大学

姚 洋 北京大学

于 安 清华大学

张成福 中国人民大学

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

周志忍 北京大学

左学金 上海社科院

Borns J. P. 香港大学

Saich A. T. 哈佛大学

编辑助理: 许根林

编辑部地址: 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00084

电话: 010-62789461

传真: 010-62782605

E-mail: Review@mail. tsinghua. edu. cn

鸣 谢

下列人员为《公共管理评论》第3卷的审稿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林毅夫	杨雪冬	刘世定
周志忍	朱 岩	于 安
顾 昕	胡琳琳	彭宗超
韩廷春	殷存毅	张 欢

宗旨与投稿体例

《公共管理评论》是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份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专业学术出版物,每年出版两卷。《公共管理评论》坚持学术为本,采用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匿名审稿制度,倡导严谨的学风,鼓励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为中国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研究者提供一个论坛。

《公共管理评论》设“论文”、“评论”、“教育”和“书评”四个栏目。“论文”栏目发表原创性的理论、实证研究文章。“评论”栏目刊登对学术流派、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和学术发展状况的评论文章,以及学术会议或其他学术活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教育”栏目刊登探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和公共管理教学的文章。“书评”栏目刊登对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及其相关领域新近出版的中文和外文著作的介绍和评论。

《公共管理评论》投稿以中文为主,被录用的外文文章由主办方负责翻译成中文,由作者审查定稿。《公共管理评论》只刊登没有发表过的稿件,不接受一稿两投。投稿体例如下:

1. 除海外学者外,稿件一般使用中文。作者投稿时应将打印稿一式三份寄至: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评论》编辑部,邮编:100084。或通过电子邮件寄至:review@mail.tsinghua.edu.cn。

2. 稿件第一页应该包括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作者姓名、单位、以及通信作者地址、电话和电子邮件地址;(3)感谢语(如有的话)。

3. 稿件第二页应提供以下信息:(1)文章标题;(2)200字的中文摘要;(3)三个中文关键词;(4)文章的英文标题;(5)150字的英文摘要;(6)三个英文关键词。

4. 注释采用脚注。脚注编号以本页为限,另页有注时,仍从①起。体例如下: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0.

Jeffrey D. Sachs (ed.),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56-59.

James G. March and Hojan P. Olse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 Political Lif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3 (1984), pp. 734-749.

James M. Buchanan, "Rent Seeking and Profit Seeking," in James M. Buchanan, Robert D. 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 (eds.), *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01.

宗白华. 美学散步.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1

孙治本. 生殖科技与人类关系-转变人类本性之力量及其风险. 中国学术, 2000, 1: 132

王铮, 王露. 论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原则. 见: 谢觉民主编.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57~78

5. 《公共管理评论》在收到稿件之后三个月之内给予作者答复。稿件如被录用, 作者须将文章通过电子邮件寄至 review@mail.tsinghua.edu.cn。

目 录

论文

墨西哥的寻租模式及其经济结果	Richard Boyd	1
欧洲一体化与公众健康——药品控制情况	Boris Hauray	31
北京市应急管理体制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万鹏飞 于秀明	41
关于临床实践、多学科和治疗网的介绍：法国癌症治疗学的重组	Patrick Castel	67
认同与台湾问题	殷存毅 吕 芳	75
和谐与渐进发展：社会话语镜像中的中国教育政策调整机制	李 钢	91
转型期我国医药腐败问题研究	任建明	115

评论

政策评估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	李 瑛 康德颜 齐二石	129
---------------	-------------	-----

书评

何静莹等：《国际视野与中国国情的融合》	张 欢	139
拉詹、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姚 杏	141
斯科特·E. 马斯腾等：《契约和组织案例研究》	孙 晖	147
保罗·A. 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	伊元甲	153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	吕 鹏	157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贺贵才	163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武 洁	167

CONTENTS

Articles

- Modes of Rent Seeking and Economic Outcomes: the case of Mexico
Richard Boyd 1
- The Integration of Europe and Public Health: The Instance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Control Boris Hauray 31
- An Analysis of Beijing Municip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Problem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engfei Wan Xiuming Yu 41
-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linical Practice, Multidisciplinary and
Treating Nets: Reorganization of the Cancer Therapeutics in
France Patrick Castel 67
-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Taiwan Issue Cunyi Yin Fang Lü 75
- The Ad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China Education Policies
within the Social Discourse Mirror Imag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ony and the Advance Gradually Gang Li 91
- Research on Hospital and Medicine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Jianming Ren 115

Comment

- A Summary of Policy Evalu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
Ying Li Deyan Kang Ershi Qi 129

Book Reviews

- He jingying, et al.: The Fusion of International Vision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Huan Zhang 139
- Rajan and Zingales: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Capitalists Xing Yao 141
- Scott E. Masten, et al.: Case Studies in Contracting and Organization
Hui Sun 147

Paul A. Sabatier: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Yuanjia Yi	153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Peng Lü	157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Guicai He	163
Go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Jie Wu	167

墨西哥的寻租模式及其经济结果

Richard Boyd*

(莱顿大学, University of Leiden)

摘 要 寻租理论试图解释依靠限价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所引起的消极后果。这些机制包括国家干预授予进口许可证、创造垄断等政治行为。最近人们的注意力被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功的故事所吸引,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广泛存在的寻租被证明与高速度经济增长是相容的。日本和中国台湾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就吸引我们去辨认这些国家和地区租的具体样式或寻租的模式,评估租和寻租到底对它们的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本文试图在经验判断的证据上建立识别墨西哥的寻租模式。作者认为,墨西哥存在着一个与众不同的寻租模式,即同一的社会和文化认可以及深植于实践中的权力。墨西哥寻租模式中公共机构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还表现在国家的政策理解和掌舵能力上。

关键词 墨西哥, 日本, 寻租

虽然墨西哥并不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其存在非常严重的经济增长不稳定和收入不平衡,无知导致人们对政治、经济上的很多事务常常处于猜字谜的状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墨西哥的确存在成功之处,尤其让墨西哥人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从1940—197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在这期间,墨西哥年均GDP增长率为6%,经济保持着低通胀的态势,而且社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这个奇迹并没有持续。一些目光敏锐的观察者指出,后来的失败深深植根于这些发生经济奇迹的年份,它被评论为“害人反害己”^①。这个奇迹并不像它曾经看上去的那么不可思议^②。而最近,我们

* 荷兰莱顿大学日本和韩国语言文化系。通信地址: Department of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Leiden University, Arsenaalstraat 1, 2300 RA Leiden; 电话: 00-31-71-5272550; E-mail: R. A. Boyd@LET.leidenuniv.nl。本文由刘鼎盛、禹思翻译,许根林校对。

① C. W. Reynolds, "Why Mexico's 'stabilizing development' was actually destabilizing (with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World Development*, Vol. 6, No. 7-8 (1978), pp. 1005-1018.

② H. A. Camin and L. Meyer, *In the Shadow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3, p. 260. See also, D. C. Levy and K. Bruhn, with E. Zebauda, *Mexico,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149-179.

又一次看到了墨西哥经济成功的现实,这次的情况是在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下,资本和国外投资得到了回报,并且产出增长不断增加^①。同样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墨西哥经济成就的程度和持续性。Cypher^② 在他所定义的经济病理学的批评上尖锐地指出:墨西哥的新自由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总统德拉马德里执政的六年间,起的作用非常缓慢并且摇摆不定。并且在总统萨利那斯执政六年期间,单纯的报复心理造成了1994—1995年“比索危机”的破坏性影响。其结果是造成了不寻常的价格上涨,而新自由主义贸易模型的基本活力也无法得到体现。相反,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大量贷款,伴随着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迅速增加——进口84%的墨西哥出口品的目标,以及1991—1998年在美国市场的长期扩张(在1995—1997年处于加速中),正好解释了“墨西哥模型”的存在。此外,促使大量贷款的主要动力(大量贷款回归给墨西哥带来的是信用和贷款负债)和墨西哥出口带来的美国市场的扩张,是病理的两个重要因素。

(1) 毒品资本主义。虽然其增长不能被精确地衡量,但是无可非议地起了一个类似于稳定器的关键作用,而现在则充当了主要的外汇收入者。

(2) 移民。墨西哥最悲哀的出口,当宏观经济状况在1995年和1996年的初期处于最低点的时候,仍旧推动着外汇收入^③。

简而言之,墨西哥获得了有限的经济成功,并且如果我们了解了社会和司法的一般性,我们会认为它取得了更少的具有发展性的经济成功^④。

解释发展性成功和发展性失败

有效的“发展型国家”被用来解释日本和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成功,同时,也经常被用来解释墨西哥的经济失败。举例来说,Lusting用“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高度的国内存款比率、系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公平的进口条件、在外汇中没有实际的限制但是与执行相连的国家干预”,来说明“东亚发展模式的主要典型特征”。与这些东亚发展模型的特征不同的是,只有墨西哥存在着谨慎的宏观政策^⑤。从表面上来看,这似乎有点令人惊讶。在许多方面,墨西哥的外部环境似乎比日本更利于“发展型国家”的产生,墨西哥的执政者享有高度集中的统治权。与其相比,日本

① N. Lustig, *Mexico: The Remaking of an Economy*, 2nd ed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② J. M. Cypher, “Disaccumulation, Dependence and Delegitimation: The Tripartite Crisis of the Mexican Stat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Chicago, Illinois, 1998.

③ J. C. Castaneda, *The Mexican Shock*,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

④ Lusting 甚至指出“从远景来看,当代墨西哥的经济历史表现出一种后退”, see N. Lustig “Failing to take off: Mexico's economic saga,” in T. Yanagihara and S. Sambommatsu (eds.), *East Asia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Economic System Approach and Its Applicability*. Tokyo: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7, p. 270.

⑤ Ibid., p. 271.

拥有小范围的行政权力,而且官僚与商业利益紧密联系,以至于有了“弱日本政府”^①的说法。然而拥有日本统治者只能梦想的权力的墨西哥总统们,因为严重缺乏社会需求,他们也希望有时能让自己与商业利益和工作隔离开来^②。这样看来,似乎墨西哥的行政管理比较明显地更符合很多发展型国家期望经济变化的关键前提。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集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比较是不够的,虽然它们是必要的条件,但是就像很多人讨论的一样,这些条件是不充分的^③。我们也不能从任何意愿的缺失中解释区别。对于一个发展型政府来说,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阻碍,也不是因为政府没有“发展型角色的意愿”(简单来说,墨西哥的案例,对 Haggard 有关发展目标的追求,精英干涉的问题上,有了一个很清楚的答案)^④。与之不完全一样的是,墨西哥的社会改革是宪法的一个目标。墨西哥政府在战后的确为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令人信服的是,失败可以归因于不合理的政策选择。有很多关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拉丁美洲发展的低速路径)和出口导向工业化(有效的东亚发展路径)之间的程式化比较。毫无疑问的是,这之间存在很多不同,但是墨西哥的故事又是另外一回事。自从墨西哥在完全不同的国家导向发展战略下——干涉主义和“撒手不管”,经济运行就产生了不调和的状态(这些都发生得非常突然),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在1970—1982年被认为是“显著的向内看的封闭性政策,政府主动干预经济,追求高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严重依赖于国外的贷款来解决财政差额”,这个战略在1982年被放弃,而到1985年又回归。这被看做是政府的复旧、国家驱动的贸易和投资障碍的缩影以及保守的财政政策的重启。因此,“前任总统德拉马德里执政一直到1998年,从1986年加入GATT,到1988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加入经合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1995年的大量贷款,每一个主要的经济政策决定,都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制造业增长来推动社会经济变化等观点的结果”^⑤。

如果问题不出在政策选择上,那么则有可能是缺乏关键的维持政策的适当制度安排,以保证政策的执行和政策之间的一致和融合,促进对政策执行后果的战略性调整。有一些学者认为,建立连贯而有能力的专家统治对财政和银行制度的稳定有重要意

① See J. O. Haley, “The paradox of weak power and strong authority in the Japanese state,” in R. Boyd and T. W. Ngo (eds.), *Asian States Beyond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5, pp. 67-82.

② M. A. Centeno, *Democracy within Reason: Technocratic Revolution in Mexico*, 2nd ed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③ 发展型国家的论题本身就是富有争议的。我们的观点与 G.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s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接近。这个论题,无论其重要性,在日本学者和西方学者的支持中没有取得一致。在考虑这种不一致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类似的重要性警告,与日本的工业政策相关。一个平衡的观点,参见 R. Komiya, M. Okuno, and K. Suzumura (eds.),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Tokyo: Academic Press Japan, 1988.

④ S.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Cypher, *Disaccumulation, Dependence and Deligitimation*, p. 7.

义^①,并且进一步来看,如果这样一个政策一体化的制度在墨西哥遭到失败,可能会令人诧异。尽管书面形式上没有太多关于日本和墨西哥有关发展政策的制度支持方面的比较,但可以论证的是,墨西哥拥有与日本一样具体的关键性制度建设。

有关发展型国家的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干预质量予以关注。干预,如果超出了建立市场经济的自然和社会基础的最小必要条件,就会导致市场扭曲和租的产生。如果它们遇到适当的市场环境,允许它们拥有市场相容和市场纠错的特征^②,就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好的作用。这个潜在的租效用,用产业政策术语来说通常被称做选择性补贴。“挑选赢家”、“工业定位”、“幼稚产业保护”等都是类似的名词。毫无疑问,合理化的冲突,同义反复和经济主义的因素都是存在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产业是成功的,都会相信是由于政策的原因,尽管这些定义在理论上比较难懂,但这些政策却被最终定义为市场相容和市场纠错)。将这些诡辩的话放在一边,事实上,租和寻租行为被认为是日本政治经济的重要特征,而且被认为对经济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日本政府对此曾经有过非常正面的报道,而且它被广泛地赞美为经济成功的建设师。最近,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媒体对政府的报告更多的是任人唯亲和腐败。在上层官员中充斥并隐藏着大量的同流合污行为。曾经被认为是优秀统治保证的官僚机构,也失去了原先的光环。越来越多的观点是关于行政管理是不充分、不稳定而且容易腐败的。简而言之,日本已经开始面临与墨西哥相似的统治问题。对于墨西哥政府很少有良好的报道,而且它一直被认为应该对从1970年以来长时间的经济恶性运行负责。政府官员、政府机构以及通过合法的或政治途径批准的与国内产业保护相联系的垄断者经常被指责。新自由改革之所以被广泛地鼓吹,主要是因为它允诺扫清广泛而深入存在的,带来扭曲行为的寻租活动。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日本取得了经济成功而墨西哥没有,并不是后者有寻租活动而前者没有。普遍的证据表明寻租活动和任人唯亲在两个国家都同时存在^③。我们感兴趣的是墨西哥拥有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寻租模式,而这种模式导致了它与日本极其不同的经济后果。Khan 和 Jomo 对租的自相矛盾性就解释得非常清楚。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个自相矛盾性是指在发展中国家寻租非常普遍,而且不合法形式的租经常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破坏。而另一方面,很多不同类型的租和寻租活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④。这个自相矛盾性使得一些学者试着去区分租的好坏。然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那么清楚和一致的。它可以是在能够增加价值和不能增加价值的租之间的区别,可以是在对发展有功效的和没有功效的租之间的区别,可以

① Centeno, Democracy within Reason.

② Doubts have been expressed concerning the rigour and adequacy of these conditions—see Komiya, Okuno, and Suzumura,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③ 事实上,有相当多的杂志比如 *Economist*(《经济学家》)用大标题来鼓吹日本的经济复兴,“The Sun also rises”, October 8th-14th., 这个日本的发行物充满着大量的最新的丑闻,揭示广泛的寻租、在桥梁建筑公司串通投标。这些被告公司包括那些以日本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急速增长著名的普通的公司。

④ M. H. Khan and K. S. Jomo (eds.), *Rents, Rent-See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Evidence i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

是在那些能够相容市场和纠正市场的租之间的区别,或者是发挥与市场一致的功能和与市场不一致的功能的租之间的区别。这些区别在实践中甚至可以变得更加难懂——它依赖于回溯性的判断,这些判断强调结果和产出而不论它们是有意还是偶然的。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寻租的假定结果也会变得不同(日本在1990年的情况与1980年的情况不同),对租是好是坏的判断也一样。因此,普遍认为在日本和墨西哥都存在寻租活动,但是在日本,直到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爆发以前,租基本上都被认为是好租。当然,也有人怀疑日本的租可能不都是好租,而且更确定的是,租可能因为它们的有效性而存在。但是在墨西哥,租和寻租在1970年以前可能是一个混合体,但是从那以后,这个混合体更趋向于不好。因此,对于墨西哥来说,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来扫清租、寻租和它们所带来的扭曲,时机已经成熟^①。

总之,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而且现在我们需要克服和摆脱它,因为租和寻租在某些方面是和上面列出的发展型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干预”,是任何超过不可缺少的最小充分性来建立法律规则、产权和契约的完整性的干预。从这个观点看,潜在的妥协产生了租。在发展型国家的工业政策中,这很大一部分关系到租的战略性和战术性配置,其成功依赖于对寻租科学和关于私人部门伙伴、顾客和其他利益集团寻租倾向的猜测。同样的,发展型国家的“隔绝性”和“植入性”可以作为成功接近租和控制寻租的理由。发展型战略,包括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都对寻租非常敏感,而且非常依赖于一个国家优化寻租科学的能力。官僚机构是这些政策的主要负责人,并且代表性的官僚机构负责发展型国家战略的设计和执行。与此同时,那些控制寻租行为的“守门人”也成了潜在的寻租官员。简而言之,对于发展型战略的成功和失败很难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尤其是那些关于租和寻租理解的解释。同时,认为寻租活动是一种失常现象的解释也很少。严重的不调和理解的主要障碍共同存在着。

我们的出发点是基于租和寻租的正常状态。我们期望在分析租和寻租时可以有更多的分析时间,这样我们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来避免匆忙作出决策。我们关心的是经验主义的调查和关于租和寻租活动的描述,将租和寻租视为日常政治经济生活的正常特征,尝试从这一方面使其变得有意义。我们希望能够理解租和寻租活动是怎样配置公共资源(而且我们应该考虑租和寻租的经济产出),同时根据经验和更高的市场逻辑,努力探索所有能够解释它们的方法(通过类推、功能性同等化、对应等)。

“寻租模式”的概念

租是内嵌在政治的每个部分的,就如同政治经济学中每个部分都考虑经济因素一样。因此,在表面的经济目标下,这经常是服务于政治目标(追求权力、对支持者的回报等)的一种资源和手段。我们特意谈到租的嵌入性:它们与追求和巩固权力的联系

^① 关于这些改革成功的有趣评定可以参见 Aaron Tornell, *Economic Crises and Reform in Mexico* pp. 127-150 in Stephen Haber (ed.), *Crony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Theory and Evidence*,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2002.

是如此紧密,以至于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一种文化(一整套调节它们使用方式的理解方式、价值观念和偏好),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是一种强大的和难以动摇的制度习俗。为了能够抓住这种现象以便于进行比较,正如我们已经提出的,称其为寻租的模式是有帮助的。这样的术语有助于我们把握某个国家租和寻租的特性,因为虽然这种行为(租和寻租)是一般性的,但是租和寻租间的关系并不是一般性的。事实是它们既有相通的一面,也有因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同样的政治问题(如何创造秩序和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权威)产生的不同反应。在现有的政治模式下(而非市场),通过占有和分配资源寻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就导致了不同的寻租模式。我们的假设是,不同的寻租模式导致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最终导致不同的经济产出。

我们认为,首先,从事实上分析考虑寻租模式是非常有用的。其次是尽可能有说服力地说明不同国家的寻租模式实际上是不同的。我们的关注点是解释墨西哥的寻租模式以及它所带来的经济影响。我们将通过比较来简单明了地揭示墨西哥案例的特殊性。为了增加这种比较的说服力,我们将从总体上比较墨西哥寻租模式和日本寻租模式。

墨西哥寻租模式:概述

在墨西哥,租文化在殖民时代就被确立,在梅斯蒂索的政治文化中被更新,但在与腐败(形式上表现为不合法的個人利益的追求^①)联系的墨西哥革命中并没有被干扰。公务员认识到怎样利用他们的职位来制造腐败。职位被购买和出售,其他职位在对公务员的聘用中被出售。职位本身可以看做是制造腐败的途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政府职位提供了创造或是接近经济领域来产生租的机会(垄断,许可证,特许权等)。这些职位(在没有更好解释的时候,我们称它为租的手段)可以被购买和出售,公务员消耗的租与其他原因疏离的租一样多。简而言之,在墨西哥,租文化被定义为办公室一租网络。租文化已经被制度化为一种副产品,它是权力和权威问题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尤其是在 *sexenio* 和 *imposicion* 中^②,总统的选举制度和相关的规章制度注意到了租文化的制度化。

墨西哥寻租模式的结果是它有一种寻租配额最大化的趋势,因此它最大化地保证了腐败堕落的可能性。那些产生租的经济职位配额的可能性,已经被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所增强,因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需要在国家和政府中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墨西哥,更多的国家干预意味着更多的租。租的动员和配置是保证政治支持的基础,它已经是从大企业私有化方式到擦鞋许可证等所有领域和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观点。这种趋势越来越被其他根深蒂固的不正式的制度所加强和巩固,尤其是在雇佣关系上。

① 腐败不可以简化为租。腐败包括贿赂。随着经济发展的租和寻租已经成为了腐败体系中的优势要素。

② *sexenio* 或是六年时期指的是不可重复的总统职位期限的长度。*imposicion* 指的是即将离职的总统指定他的接任者的行为。

租的增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限资源的重新配置（有限是因为资源大部分掌握在政治、商业和官僚精英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手中）；资源的浪费（主要针对非经济的标准）；发展主义者所谓的领导职能的腐败。政府官员领导职能中的腐败并不是最少的，政府机构的职位因为可出售，因此成为接近租的常用方式。这就导致了政策被理解为产生租的一种方式以及如何产生更多租的方法。职位的设计和持续产生的租（或者称为我们曾经定义的租的手段）腐蚀了领导职能。那些寻找政治支持的人鼓励职位租的增殖来使那些能得到回报的支持者的数量达到最大化。相反的，政治家以及官僚精英很少对租的配置和租位置感兴趣，主要是为了保持领导职能以及在面临没有政绩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地撤销租来保证执行。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官员是软弱的或是腐败的，而是六年总统制限制了他们的时间范围。因此，政府官员永远准备好远离产生租的职位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手段。更重要的是，寻租模式提供的利润机会鼓励公司集中在他们对国家的成就上（这样他们就会被奖励租），即将目标集中于对租的夺取上而不是关注市场和寻找保护竞争性优势上。简而言之，他们更多地参加寻租而不是寻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没有明显地改变墨西哥寻租模式。办公室一租网络仍旧维持着，而且私有化为寻租创造了新资源和新机会。这增强了经济集中、部门化垄断以及寡头垄断的趋势，寡头垄断中，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的企业成为了主要的受益人。

日本的寻租模式及其经济后果：简短的概述

如何与日本进行比较呢？我们曾经在其他地方论证过日本管理经济的政府部门偏好裁定给企业团体的租，以及把租作为奖励来鼓励组成企业团体，以至于谈论卡特尔一租网络就想到了日本。在日本，由卡特尔一租网络确定对租的裁定、寻租者的性质和组织方式以及设计租本身。简单而言，卡特尔一租网络，其中调节卡特尔是最典型的，在日本的寻租模式中居于核心地位。这种调节卡特尔在日本的政治经济领域和在典型的与少数主要公司联系的部门——古典金字塔形工业组织中的租配置中非常广泛。这种寻租模式的起源是多方面的——战前的实践、长期不变的政府价值观、政府官僚的特性、日本经济组织的特殊模式以及历史文化。而且，这种寻租模式被高度地制度化。在日本，对调节卡特尔有书面的规定。

我们注意到在卡特尔一租网络支撑下的经济行为完全不同于在以办公室一租网络为特征的墨西哥寻租模式支撑下的经济行为。卡特尔是按部门形成的，所以租也是与整个部门的利益相连接。这里利益的概念不能按照市场中的利益去解释，而是一种从“过度竞争”下的从业者的角度理解的卡特尔化利益，这也许是对日本经济按照产业组织的公司所关注问题的一种响应，这种关注与西方经济下所关注的问题有很大差异。这种卡特尔一租网络与租的设计是一致的，而所设计的租本身支持并兼容于经济业绩的标准（这点可称为经济偶然性）。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因为卡特尔内在固有的不稳定性，天然的短命，总是可以更新，总是可能由于内部离心因素的加剧而崩溃。相应

租的分配、租的设计也只有短期或者中期才会被接受,甚至最好给卡特尔成员充分的预期,如果加入卡特尔分享利益的同时不会有任何被卡特尔自身限制住的风险,否则卡特尔立刻会崩溃或者马上就要崩溃。同样,政府机构中租分配者也不会被租的设计所束缚,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掌控能力。这种条件使得下一次租的分配就会不同。不仅如此,支配调节卡特尔的管理和准则并不排除企业寻求比较优势。更进一步讲,它们在保证最弱者生存的同时,也允许对最强者寻求超额利润。

这对企业行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不像墨西哥的企业,它们的眼睛只盯着租分配者,因此都希望要么自身拥有政府职位,要么是好朋友或者赞助人拥有政府职位,而且长时间盯住一个部门,以建立垄断或者接近垄断的地位,也就是“谋杀了市场”。日本企业从来不会把眼睛从市场转移开来,因为如果卡特尔能持久下去,努力追求市场位置和竞争优势会收获丰厚的回报(超级利润),而如果卡特尔崩溃,那么每个企业又都被抛回市场,在那里有竞争力才能保证有利润。“千万不要把眼睛离开市场”帮助纠正了卡特尔化带来的僵化效应^①。

墨西哥寻租模式

1. 墨西哥寻租模式的历史起源

政治在墨西哥是最简单和最有利利润的职业。^② 墨西哥寻租模式的大致框架早在100年前就成型了。其寻租模式产生于人们将政治认为是对政府机构的追求,而将政府机构认为是个人致富的手段。Hansen 很清楚地提出以下的观点。

今天统治墨西哥的人,他们的目标和价值,他们的政治机器和他们负责的政策,放在19世纪梅斯蒂索的政治传统中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即将政治解释为社会经济流动性和个人权力的途径^③。

与日本相比较,墨西哥模式有两个惊人的区别。首先,它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政治丑闻和腐败对于日本并不陌生,但是却很难解释为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个人致富并不是政府机构的一个目标。个人权力虽然不可避免地是日本政治家们的目标,但并不是个人致富的手段。政治游戏本身才是其目的,这包括政治目标及政治地位的奖励。前总理 Nakasone 绝妙地解释道:“对于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政治都回归到如何组成一个内阁,和如何打败一个内阁”^④。在日本,因为武士、政治舞台背后的人、整个网络的推动者、国王的制造者比日本的虚幻天皇拥有更多的权力。这实

① 这个对日本寻租模式的总结节选自 Richard Boyd “Modes of Rent Seeking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Japan and Taiwan,”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3 (2005), pp. 1-36。

② J. S. Herzog cited by A. Oppenheimer, *Bordering on Chaos: Mexico's Roller-Coaster Journey toward Prosperity*. Canada: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6, p. 105.

③ R. D. Hansen, *The Politics of Mexican Development*.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8.

④ Y. Nakasone, *The Making of the New Japan, Reclaiming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L. Connors, Richmond: Curzon 1999, p. 223.